

軍隊、群眾與武鬥： 以1967年浙江文革為例

• 張君龍

摘要：隨着文化大革命的升溫，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此後各地軍隊大量介入地方事務。本文通過軍隊內的揭發、文革小報、回憶錄、口述等材料與官方的材料比對印證，嘗試對現有的浙江文革敘述提出不同看法。在浙江，支左部隊在介入伊始就造成分裂，並與群眾組織的矛盾糾纏在一起，不僅沒有促進「大聯合」，反而引起更深的撕裂與更大規模的武鬥。以往雖有學者注意到這一運動範式以及軍隊在文革中的特殊作用，但和其他地區不同，浙江的支左部隊早於1967年8月就已經根據中央的直接指示對另一派群眾組織進行了「軍事包圍」，較1968年旨在軍事制止廣西、陝西武鬥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為早。儘管中央要求軍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軍隊的直接干預始終是中央掌控運動的主要手段。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 支左 武鬥 軍隊 群眾組織

1966年5月以來，全國群眾運動不斷升溫，文化大革命勢頭逐漸變得難以控制，尤其是1967年1月的奪權風暴後，各地的群眾組織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分裂與混亂。為穩定局勢，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發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以下簡稱〈支左決定〉），各地軍隊正式介入文革。但是從地方的角度看，軍隊的介入並沒有促進「大聯合」，反而造成了鋪天蓋地的「武鬥」。以往有關研究多聚焦在四川、重慶、廣西、武漢等地的武鬥，對浙江省的研究較少。在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浙江同樣是武鬥的「主要戰場」之一，舟山地區的派性衝突甚至到1970年也沒有解決^①。

單就浙江文革而言，已有一些學者進行過探討。如余汝信曾討論解放軍在浙江文革中扮演的角色，但與中央層面的細緻分析比較，對軍隊在地方支

左的論述就顯得有些美中不足，多為材料的堆列，對部分事件的敘述也不準確^②。福斯特 (Keith Forster) 在 1990 年曾就浙江文革的派性問題寫過專書，由於當時在搜集材料方面並不如現在便利，其材料主要來源於《浙江日報》與《杭州日報》。然而，類似《浙江日報》這樣的省級大報並不會像群眾刊物那樣對地方上的武鬥和軍隊間的矛盾進行太多報導，所以福斯特的不少論點存在些許關鍵的錯誤，直接影響其結論中派性分析的準確性^③。

董國強和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對地方派性衝突已有過大量研究，也注意到軍隊的特殊作用。在關於江蘇徐州的個案研究中，他們提出兩點結論：第一，現存的體制性因素沒有促成 1967 年前三個月群眾組織的分裂，而是軍隊的介入加劇了派性分歧；第二，派性分歧最大的因素是中央的不同意見，而不是戰爭年代不同軍隊譜系在支左問題上的分野^④。這些現象都可以在浙江找到共通性，但與江蘇稍顯不同的是，除了給予軍火以展開「代理人戰爭」外，浙江軍隊還採用了「軍事包圍」的方法圍剿對立派別。魏昂德近年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對廣西個案進行過專題研究，廣西的特點在於其大規模的軍事進剿發生在 1968 年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⑤；又因為同期進行的越南戰爭，其地方軍政一號人物韋國清在文革中始終沒有倒台，所以軍隊得以維持組織大規模軍事進剿的能力^⑥。這使得廣西成為一個獨特的個案。不過，筆者發現軍事進剿的情況並非僅限於廣西，浙江在更早之前就有軍隊的直接鎮壓。

本文通過軍隊內的揭發、文革小報、回憶錄、口述等材料與官方的材料比對印證，嘗試對現有的浙江文革敘述提出不同看法，尤其關注最為關鍵的 1967 年，並為武鬥爆發的原因給出部分解釋。文章初步認為，雖然軍隊的介入是為了促成大聯合，但是從一開始就造成了軍隊與群眾組織內部的分裂，其結果是釀成更深的矛盾與更大規模的武鬥。同時，儘管表面上中央對軍隊的要求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⑦，但早在 1967 年 8 月，浙江軍隊就在中央的指示下對另一派群眾組織展開直接圍剿，而不是在 1968 年旨在軍事制止廣西、陝西武鬥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後才開始；此後，建立革委會所採用的辦法也遠不止赴京談判，動用軍隊始終是掌控運動的主要手段。從浙江的支左起源也可以看出，軍事參與在 1967 年就已經出現，並在此後被不斷被使用^⑧。雖然文革期間「軍民團結如一人」的口號層出迭見^⑨，但「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演變為「武化大革命」。武鬥幾乎在部隊的全程主導下進行，對於被圍剿的所謂「叛亂」份子而言，「支左」二字看似並不那麼輕描淡寫，反而伴隨着相當殘酷的打擊行動^⑩。

一 群眾派性的形成與軍隊早期的介入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廣播，致使全國各地先後展開了校園裏的批判運動。3 日，浙江大學內隨即貼出針對校黨委的大字報，批評校黨委壓制運動^⑪。隨着批判的進一步深